



民族政治学丛书
Nationality Politics Series
丛书主编 / 周平

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National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a

张健◎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民族政治学丛书
丛书主编/周平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张健◎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
张健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117-2692-6

-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2131号

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巍

责任编辑：侯天保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真：(010) 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277千字

印张：18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65.00元

网址：www.cctphome.com 邮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序

最早在西欧出现的那些原生态的民族国家，都是以一个在王朝国家条件下整合起来的同质化的民族为前提和基础的。其实，欧洲那些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就是为解决王朝内的民族觉醒后与王朝形成的二元对立而创制的国家形态，本质上是一套实现和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框架。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民族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成为了国族。因此，欧洲的民族国家与国族是相伴而生、相互构建的。然而，对于那些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影响、示范以及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采取民族国家制度架构的国家来说，为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进行国族构建和民族国家建立后的国族建设，都是一项历史性的社会政治任务。

这样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就明显存在。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形成和存在众多的民族群体，它们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也逐渐凝聚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以“中华民族”为族称并实现民族的自觉，却是从近代才开始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国族构建的关键时期。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巨大影响的日渐凸显，引起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国族构建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近年来，国族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有的研究成果还较有深度。但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国族构建的系统性、综合性并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研究成果仍付之

阙如。面对这样现实，张健在攻读民族政治学的博士期间，选择了从历史角度进行中国国族构建研究这一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

经过深入的研究，张健完成了博士论文《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作为民族政治学前沿性研究的成果，该论文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在世界各国的国族构建历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具有突出的典型性。对于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国族构建的研究视野，丰富国族构建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国族构建理论体系进行有益的探索。其次，国族作为特殊类型的民族共同体，其形成并不是自发而为，而是主动构建的过程。通过分析国族构建措施的具体语境和制约因素，对各项政策进行还原与解读，能够为当代中国的国族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与历史参考。

同时，该论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突破与创新。首先，在国家范式转换的背景下，将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构建紧密地结合起来，恰当地解释了国族构建的条件和必然性。对于国族构建而言，只有国家范式发生转换，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与制度导向，国族的构建才能获取其内在规定和现实价值。其次，近代中国国族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需要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全景式的立体型分析。该研究尝试构建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对国族构建开展了更为全面的研究，拓展了国族研究的理论视野。最后，近代中国国族的形成是主观构建的结果。该研究具体分析了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权开展的国族构建，从而将国族构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具有历史的纵深感。

该论文完成后，在校外专家匿名评审、博士论文答辩各个环节，都得到了专家的较高评价。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张健又根据博士论文答辩时专家们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将博士论文加工成为目前的著作而公开出版，既为了让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有助于人们对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认识和了解，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支持，也为了求教于方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朝着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方向发展。

目前这部著作，标志着国族构建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国族构建涉及面极广，许多问题需更加有效、合理的解释，该领域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希望张健博士对这一问题给予持续、深入的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人关注这一领域，并产生出更有价值的成果。

周 平

2015年2月3日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人作为群体性的类存在物，从其诞生开始就需要一种凝聚与调节机制，建立秩序、解决公共性问题，进而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这种机制的核心就是公共权力，也正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治理，人们创造了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机制”^①，而这就是国家。从此，国家成为人类最核心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延续至今。在这期间，国家的形态不断发生演变，仅以欧洲为例，就先后出现了城邦国家、罗马帝国、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直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起源于17世纪的西欧，“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②。民族国家产生后，凭借其特有的制度优势，迅速成为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③

①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②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虽然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但民族国家的建设却仍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而其中，国族建设又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所谓“国族”，也就是取得国家形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和解释力度，与“国族”有着紧密的联系。“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没有一个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就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只能是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虚设。”^①

而这种挑战在中国也依然存在，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代历史，也同时成为中国国族构建的重要时期。鸦片战争的爆发，把晚清帝国推进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也随之展开。国族作为特殊类型的民族共同体，其形成并不是自发而为，而是主动构建的过程。从民族概念的引入、国族符号的提出、国族内涵的纷争，到国族认同的初步生成，国族问题被多次解释和建构。而要准确剖析这一复杂进程，就必须从国家范式切入，将国族构建纳入到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之中。

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构建具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述。因为只有国家范式发生转换，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与制度导向，国族的构建才能获取其内在规定和现实价值。而且国族构建不仅是一种想象，或者说这种想象的形成本身就需要再构建，需要在共同体范围内，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形成一种切实的利益与精神感受，从而形成国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而能够为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具体民众提供这种认同机制的唯有国家政权。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持续百年的历史巨变已落下了帷幕，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雏形，与之相应的国族形态也初步显现，但中华民族的建设仍然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工

^① 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85—96页。

程。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对于族体规模庞大、内部结构复杂的中华民族而言，国族建设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而对于国族建设的系统、理性分析，首先需要的就是历史的眼光与视野，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国族的“构建”与“建设”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并不是互不相关的独立过程，准确把握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历史进程、价值理念和政策体系，本身就是国族认识深刻的一种展示，同时也能够解释与澄清国族建设中的困惑和纷争，避免国族建设中的诸多误解与独断，使我国的国族建设更具中国化、更富历史感、更有可行性，为国族建设奠定准确而坚实的历史基点。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国族构建研究，当前学术界的关注力度仍显薄弱，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也正因此，选择《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作为研究方向。

（二）研究的意义

1. 通过拓展国族构建的研究视域，丰富了中国国族构建的理论体系

国族构建是政治学、民族学和民族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由于相关族体概念和理论体系均属“舶来品”，针对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研究相对缺乏，致使中国的国族构建往往陷入西方强势话语的纷争，不利于国族建设的有效开展。其实，国族概念的普遍性并不能掩盖其建构路径的国别独特性。在世界各国的国族构建历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内部复杂的中华民族，在近百年的时间内，转型成为具有国族意义的现代民族共同体，这一成功本身就蕴含着从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因此，对于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国族构建的研究视野，丰富国族构建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国族构建理论体系进行有益的探索。

2. 通过解析国族构建的政策实践，提供了中国国族建设的历史参考

近代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是中华民族成员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而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建构主体，通过具体的国族构建政策，进行有效的宣传与动员，并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去争取独立、自由与解放。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多种政治力量，出于内外压力和政治诉求，实践了一系列的国族构建政策，既有正面积效的效应，但也存在消极负面的因素。这些政策塑造了近代国族的基本面貌，也对当代国族建设形成了一定的路径性依赖。因此，通过分析国族构建措施的具体语境和制约因素，对各项政策进行历史性的还原与解读，总结其功效成败，为当代中国的国族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与历史参考。

二、学术史回顾与简析

国族与国族构建问题受到了学术界多学科的共同关注，逐步成为政治学、民族学和民族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梳理国族与国族构建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分析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有助于深化对国族构建研究的认识，也对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学界，不同族体概念的译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其所指内涵也存在交叉，而“国族”一词的提出与选用，本身就暗含着对于族体问题的理解思路，其背后也预设了与之相关权力运行体系。“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包含着历史。”^①为此，对于国族构建的学术回顾，首先从“国族”一词的提出入手，并以直接使用“国族”一词的研究为主。

^① [英]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转引自[芬兰]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一）关于“国族”问题的相关研究

1. “国族”一词的提出

“国族”一词在汉语世界古已有之，有学者考证，先秦时期，“国族”一词就已在典籍中出现。“在先秦文献中，‘族’字的应用颇为广泛，十分多见。根据对《十三经》原文的粗略统计，‘族’字在这些文献中（除《春秋公羊传》和《孝经》外）出现多达220余处，其中可以作为复合名词等释读的用法亦多达数十种，诸如‘九族’、‘宗族’、‘世族’、‘公族’、‘王族’、‘邦族’、‘百族’、‘国族’……”^①而“《御定佩文韵府》所收录的‘族类’词语就达160余个，……区别社会地位的‘皇族’、‘帝族’、‘王族’、‘公族’、‘贵族’、‘豪族’、‘强族’、‘世族’、‘国族’、‘权族’、‘望族’、‘庶族’、‘贱族’……”^②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用“国族”一词表示我国历史上代表一定民族的小国。这些小国都是由分散成自然部落的氏族发展而来。^③

近代开始，部分革命人士与学者已经在国家层面上使用“国族”，并倡导用“国族”一词对应英文的“nation”。国族的这种提法，最早可见于孙中山1924年的《民族主义第一讲》，把“nation”表述为“国族”，称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④20世纪30年代，袁业裕也提出“国族者即居住同一区域、生产技术相同，以及其他个方面均相类似者谓之国族。民族为历史进行中自然演成之社会的形态，系由共同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而结合一致之群众集体”，提出“nation”大概系指有主权政治国家之人民，而“nationality”一字则专指“同语言与同习俗之民族”^⑤，表示出把“nation”译作“国族”的意向。潘光

① 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36—46页。

②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60—69页。

③ 柯昌济：《中国上古的国族》，载《社会科学》，1984年第01期，第41—4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⑤ 袁业裕：《民族主义原论》，正中书局1936版，第19—21页。

且 1936 年指出，“有三个名词是很容易相混的：一是国家，二是种族，三便是民族。‘国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nation’一字，便有人译作国家、民族，或国族。……国家的意义是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种族的意义是生物学的与人类学的；民族则介乎二者之间”^①。他认为“nation”既有生物学、人类学（体质、文化）含义，在欧洲还具有政治实体（国家）的含义；“state”更多地是具有政府机构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将“nation”、“nationalities”、“ethnic”等词，统一翻译为“民族”，因此，“国族”一词相对沉寂。但进入 20 世纪末，由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泛起，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再度成为时代课题。部分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族体”概念的差异，及其对应的中文译名问题。1995 年，宁骚在《民族与国家》一书中再度提出“国族”，并试图厘清国家、国族、民族、族体等概念。他从族类共同体的概念出发，区分了“作为部落的民族”、“作为部族的民族”、“作为国族的民族”和“作为狭义民族的民族”。^②郑凡等学者，也提出把“nation”译作“民族”与我国通常关于“民族”的理解存在一定距离，也由此导致了許多概念上的混乱。认为，“当初要是‘国族’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公认，它就正好与‘nation’所包含的国家及现代民族两层意思相对应了；而‘民族’一词也就可以只按民族学‘ethnology’的标准去用它，专指‘ethnic group’所包含的传统民族之义——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对两种民族概念的辨别也属多余了”^③。周平也是最早关注国族问题的学者之一，在民族政治学的创新力作——《民族政治学导论》中，专门探讨了国族问题，并从民族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界定“国族”，认为“国家民族”或“国族”是

① 潘光旦：《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 页。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 页。

③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0 页。

“执掌国家政权，并且能够代表国家的民族”^①。此后，“国族”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国族”概念的提出，并在20世纪末重新进入学术主流，既是人们深刻反思民族与国家问题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化解诸多争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思路。

2. “国族”概念的内涵

国族概念在20世纪末重新回归后，学者们对其内涵的阐释，基本上是从比较意义的层面切入，探讨“国族”与“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而其概念的核心均指向了国家或政权。

宁骚认为国族(nation)与国家概念密切相连，而民族(nationality, ethnic group)是国族内部的组成部分，国族和民族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并且特别强调说：“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②同时，“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这类基于国家的身份认同，也可以归类于“国族”(nation)。郝时远也认为，“nation”应该理解为国族，他认为“民族(нация, nation)是人类共同体依托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形成的现代形式”。通俗地理解，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居民或全部享有该国国籍的人的总称。因此，将‘nation’理解为‘国族’是非常贴切的。”^③

刘泓在《国族与国族的认同》一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在欧洲形成的国族概念，直接与国家的概念相关联。国族与民族的区别在于，前者“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后者“不必有自治权及国家形态”。西欧的“民族—国家”过程表明，国族是指有自己统一国家的人民，而民族则是指没有建立或失去独立国家形式的人民。相对“民族”而言，“国族”强

① 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③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载《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第1—8页。

调的是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而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正是“国家”（State）的基本特征，因此，把英语中的“Nation”译为“国族”或“国家”、“国民”是适当的，而译为“民族”则不甚达意。^①

朱伦对“国族”、“民族”和“族群”等概念在国外的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考察。他指出，从国族的外部关系看，自11世纪起，随着欧洲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压力，欧洲各族人民的“本地人”（native）与“外地人”（foreign）观念及其利益冲突和“地盘”（region）意识日趋增强。正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不彻底的罗马化所形成的地方语言文化资源，成了欧洲各地人民构筑以“本地人”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这种共同体就是后来的所谓“国族”（nation）。^②而就内部实质看，在近、现代西欧人的观念中，所谓“国族”，也就是一个以主权国家形式实现政治统一的“人民”。^③

周平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研究国族，认为：“国族，即国家民族，也就是取得国家形式（或披上了国家外衣）的民族，它随着西欧的民族国家构建而形成。西欧的民族（Nation），都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群共同体，都是国族”^④。这一界定，抓住了国族问题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周平对国家与国族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释。周平认为：“国族内涵中显现出来并引起关注的常常是历史、文化、语言和地域，但国族并不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群共同体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由民族国家构建起来的，因而打上了深深的国家烙印。国族的根本特性并不是历史文化特性，而是国家特性或政治特性。国族都是具体的，是某个民族国家的国族。”“因此，国家因素既是国族形成的根本条件，也

① 刘泓：《国族与国族的认同》，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6-12/19/content_7531127.htm。

② 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83—100页。

③ 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83—100页。

④ 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85—96页。

是解释国族的根本性因素。”^①

周平也分析了国族的形成历程，认为：“西欧建立民族国家前，王朝国家已经将国内居民整合为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标志着民族构建的完成，也使以国民身份为基础的民族成为了国族。”同时，也指出了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情况，即在民族国家的影响和建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压力下构建起民族国家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存在着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多个传统民族，是将国内多个传统民族整合为统一的国族而建立起民族国家的”。^②在这样的国家，国族是由多个传统民族整合而成的。如何维系和巩固国族，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3. 国族构建的路径

国族是民族国家存在和发挥制度优势的保证，同时国族又是建构的共同体。国族概念主要对应的英文是“nation”一词，西方学界对于“nation”的建构问题主要有三种倾向：第一种是强调“nation”的自然性，认为“nation”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就已经产生，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和部落自然演化而来，与地域、语言、宗教等有着紧密联系，并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如埃德华·希尔斯和克利福德·格尔茨论证了“原始”联系与世俗及市民联系之间的持久比肩共存，并认为即使在工业化社会也是如此。尤其是格尔茨还专门对原始的忠诚与在现代政体和社会的理性秩序下的市民联系作了对比。^③第二种是强调“nation”的建构性，认为主观建构是“nation”形成的主要动因，如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

^① 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85—96页。

^② 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85—96页。

^③ [英]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④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① 第三种是在批判前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族群—象征主义”，以安东尼·史密斯为代表。他认为对“nation”的理解，必须突破主客观的谱系框架，“nation”（民族）的基础是“ethnic group”（族群），族群拥有持久的文化，这并非现代构建的产物。但这也并不否认“nation”的建构原则，因为“nation”（民族）至少要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必须通过拥有它自己的故乡来把自己构建成“nation”（民族）；而且为了立志成为“nation”（民族）并被承认为“nation”（民族），它需要发展某种公共文化以及追求相当程度的自觉。^② 也因此，他将“nation”（民族）定义为：“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③

对于民族（国族）的构建，史密斯认为国族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环节：“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神话以及象征符号的生长、培育和传递；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仪式的生长、选择以及传递；‘民族’共享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可信性’要素的确定、培育和传递；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和制度在特定人群中灌输‘可信性’价值、知识和态度；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的界定、培育和传递；在被界定的领土上对技术、资源的选择和使用；特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利和义务的规定。”^④

国内学者对于国族构建的研究中，周平的研究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② [英]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③ [英]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④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国族构建的本质与核心。周平始终将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国族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关系。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构建国族的过程。民族国家建立之时，也就是国族形成之际”。他还指出了国家构建国族的基本途径，“为了维系和巩固这个共同体，国家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来加强它的整体性，提升其一体化的程度，开展内容丰富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而且特别强调了国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国族认同——对所属国族的认同就意味着对其他国族的不认同——是国族存续、稳定和巩固的基础性条件”。针对国族内部族体关系的情况，周平又特别强调了同质性国民身份的重要性，“构建和强化国民社会身份的同质性，是国族与国内传统民族间存在差异的国家的国族建设的根本所在。而强化国民社会身份同质性的过程，也就是建立以公民身份作为最基本社会身份的公民社会的过程”。^①

杨雪冬从区别“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的视角入手，认为“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就是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的三组关系，“社会个体—国家、族群—民族，以及族群之间”及互动结果的两个层面，“一是包括个体、族群在内的社会活动者共同‘认同’感的达成。这需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心理取向等要素的形成；二是这些行为者生存空间的确量化，这要求有共同的生活地域”。^②

陈明明着重从政治建设的角度，论述族裔融入国族的过程，认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福利建设都在发挥着族裔融合的巨大功能，但国族的整合最终还得取决于政治建设的进步。这里的政治建设固然包括领土疆域、国家主权、政权体系等内容，但更为关键的是国民政治认同的形

^① 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85—96页。

^② 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建构：一个理论综述》，载《复旦政治学评论》，2005年第3辑。